

從反思性看當代西方社會理論¹

安東尼·伍迪維斯

首爾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反思性是社會學的一項基本品質。然而，近二十年來，許多社會學家卻過度沉浸於反思性所取得的成就，從而不自覺地滑向了唯我論。這突出地表現在，當代社會學話語中“認同”吞噬了“社會結構”。本文從實在論的角度，結合各個時代的話語構型，解釋了“認同”這個概念為什麼會出現並廣為人們接受。有四個要素發揮着關鍵的作用：第一、社會學思考重心由歐洲移至大西洋；第二、美國社會學偏重個體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張力，並用現代性、種族、族群和性別等術語對此進行刻畫；第三、20世紀70年代美國步入後現代性，以及隨之而來的“關注內心”的轉向，使得認同在社會學中大獲全勝；第四、對話語的誤讀。

緊接著，愛麗絲穿過了鏡子……然後她開始環顧四周，並發現這個古老的屋子裏的東西非常普通和乏味，但也有些東西有些奇特。例如，有壁爐的那扇牆上的圖片看起來活生生的，而壁爐臺上的時鐘（當然，在鏡子中只能看見它的背面）看起來像個小老頭，正沖著自己咧嘴笑。它們給這間小屋增加了生氣……²

一 社會學與反思性

在社會學中，反思性的實踐就相當於一面鏡子。日常生活中，當人們對鏡自照時，或多或少地預料到了會出現的結果；



這些結果當然也包括我們典型的自欺，即認為自己比實際年輕十歲，估計心理分析師也會這麼說！同樣地，當我們從當代西方社會學反思性這面鏡子來看待社會學的發展時，也會覺得一切都很好，或者確切地說一切都很健康。然而，愛麗絲的鏡子畢竟與眾不同，當她穿越鏡子時的所見顯然不同於常見。事物絕對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勾畫出在社會學中相當於愛麗絲的鏡子之物，即一種反思模式。該模式將指出，在社會理論這個領域中，事情也絕非我們想像地那樣簡單，原因就在於，不僅社會一理論的空間並不像我們通常認為地那樣整潔，而且就像愛麗絲所看見的時鐘和圖畫一樣，該空間的事物也有其他的面向和意義。

“反思性”這一術語的核心要義就在於它具有這樣一種能力，能夠反省某人的思想和行為，並根據反思的結果對之做出調整。就此而言，反思性一直是人類（不管是個體還是群體）智識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一直都注意到了這種能力——追問自己為何要以某種方式思考和行事；而且也一直很重視這種能力——它能改善，至少是改變，我們自身以及我們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就社會科學領域而言，該種能力產生的最深刻的結果就是一系列能夠指導我們研究策略的元理論立場，如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實在論、解釋學、後現代主義等等。作為元理論方面的實在論者，筆者認為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許多社會學家，尤其是那些自認為是理論家的學者，過度地沉浸於反思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從而不自覺地滑向了唯我論之境地。最初，反思性是就客觀觀察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對那些天真的經驗主義者進行矯正而流行起來的，而現在卻導致了理論家頭腦中出現了這樣一系列的困惑：不僅知識是有限的，關於世界的知識也是有限的，而且理論家自己的觀念也是有限的（筆者特別關注這個問題）。結果就是西方社會學界的知識氛圍演變到了如此境地：談論和寫作



理論有效地取代了調查研究和以此為基礎的創作理論。最終的結果就是，各種奇異卻並不值得讚歎的人文唯心主義盛行，並將社會本身描繪為一種具有反思性的類人動物，從而將社會消解為其個體構成：

貝克和吉登斯等分析家問道，當現代性開始反思自身時，會發生什麼呢？當現代化開始將自己作為反思的對象時，反思自己的過度和不斷激增的破壞性的（對內部、外部和社會性自然）征服時，又會發生什麼呢？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的這種新的自反性遠遠不是後來所說的“自由意志”對“宿命論”和“決定論”的勝利所能囊括的。相反，它是一種內在於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發展。在某一歷史時刻，它也可能是進一步現代化的功能前提的發展條件。在二十世紀晚期，如果作為經濟增長的現代化要繼續可能的話，那麼就必然要求勞動力具有較好的資訊加工的能力，也就是說必須受過很好的教育。該教育過程中培養的解決問題和提出質疑等能力也成了一項前提條件——為理性地批判“系統”的相關知識的獲得做好了鋪墊。如果現代化預設了不斷強化的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³的話，那麼很少被傳統習俗束縛的個體就會越來越自由，並且站在異端的立場看待現代化所產生的反而烏托邦(dystopic)。這實際上就是反思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和“簡單的”現代化的區別所在……簡言之，如果簡單現代化意味著征服，那麼反思性現代化則是對主體的賦權。如果簡單現代化給我們呈現的場景是福柯所說的原子化、規範化和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話，那麼反思性現代化展現的則是真正的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一種積極的可能性——面對自然的、社會的和精神的環境時，自主的主體性是可能的。⁴



我對上面這段話的一些說法抱持懷疑態度，在此，我著重強調其中兩點。第一個問題是這些學者的潛在的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傾向，即將社會看成類似於人的存在物。這種擬人論將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看成是一個巨大的轉型——現代化，這個貪婪的、類人的怪物轉變成了由許多“真正”的善德的個人組成的共同體。這種轉變的發生得益於這個怪物的反思能力。其次，他們還極度依賴於這樣一個觀念，即盛行於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風險測評是與知識份子的反思能力密切相關的。他們認為，風險測評通常是一種減小或者逃避責任的手段，而知識份子的反思則通常正確地表現為揭露並且承擔責任的策略。

如果嚴肅地看待反思性的話，就不會出現那種看似既是其原因又是其結果的擬人論和唯我論了。皮埃爾·布迪厄雄辯地指出，⁵ 反思性是非常重要的，它能有助於我們規避不斷重複的常識性觀念，即福柯所說的未思（*unthought*），並避免強化這些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常常是不平等的權力安排的結果，並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這種不平等。總之，實踐這種反思模式有著重大意義，能使我們批判性地意識到自己的假設和偏見，還能使我們意識到在我們感興趣的領域和專業領域中的知識和權力的關係；將這種洞察力付諸於實踐還能帶來其他的益處——它能避免我們將學習來的思想觀念與我們自己的想法，以及我們自己對社會的認識相混淆。

鑒於此，就不能簡單地將反思性等同於對抽象的臆斷、偏見或者德里達所說的先前知識（*prior reading*）⁶ 的內部審視。儘管這些個人性的東西（即臆斷、偏見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會產生強大的效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所見所描述的就是這些內部的精神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響。實在論堅信，外部世界必定具有某種特徵，這樣才能為我們所知覺，並與之發生作用（例如，科學試驗）。儘管我們的知覺異常多樣，儘管我們有可能根



本不知外部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但是上述這種觀念對實在論者而言是根深蒂固的。而就當下的討論而言，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不僅是外在於我們的，而且還是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告訴我們：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應該怎樣思考我們的所見。這樣，“社會學家肩負的一項重任就是去瞭解社會世界這個客體，而他本身又是社會世界的產物，因為他所提出的關於社會世界的問題以及所使用的概念都是社會世界這個客體的產物”。⁷ 因此，“社會學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應該受到譴責，如果他對自己的思想不加以反思的話。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過是自己聲稱所要思考之物的一個工具而已”。⁸

由此，我們就需要理解未思的本質，並對之進行深入思考，這樣，未思就也能被反思了。在我看來，這種實踐是建立在古典社會學關於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的長期探究的思想傳統之上的。我認為福柯所提出的話語構型（discursive formation）或者話語的社會機制（dispositif）這個概念多少是有些爭議的，而且我還認為這個概念與實在論是相容的。⁹ 照我的理解，一種話語構型就是對社會條件和智識條件的具體化，這些條件使得話語的產生成為可能，並賦予了話語以內容。具體而言，這種具體化就是界定和命名感興趣的客體，提供人們一系列方式使之能夠談論、概念化和主題化（thematize）該客體。接下來，我將根據自己對福柯的話語構型這個概念的實在論的解讀，闡明實在論者的反思性包括什麼以及它會產生什麼效果。這樣，就能解釋當代社會學話語中認同這個概念是如何吞噬了社會結構這個概念的。

在我看來，有四個關鍵的因素作用於這種吞噬（即一種社會意象取代另一社會意象），而對它們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深入地瞭解那些制約著二十世紀晚期社會理論對世界的描述的話語構型的深層結構，儘管我的闡述可能比較概要化。首先，隨著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以及隨之而來的冷戰，社會學思考的重心



已由歐洲移至大西洋，原因就在於美國及其特徵顯著的個人文化在社會學的發展中佔據了核心地位。¹⁰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北大西洋公約的導言部分明顯地將“共同遺產和文明”的本質狹隘化了：

締約國各方本著聯合國憲章之精神和原則，保證與其他民族和國家和平相處。堅決捍衛建立在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等原則之上的人民的自由、共同遺產和文明。締約國各方竭力促進北大西洋地區的穩定和福祉；團結一致，採取集體行動以捍衛和確保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締約國各方均同意北大西洋公約的各項條文……

值得注意的是，該公約根本就沒有提及工會、社群夥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福利國家等等，而這些是當時西歐文明的顯著特徵。其次，美國社會學不同於歐洲社會學，它對階級並不感興趣（在歐洲社會學裏，階級是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也是社會結構的一個例證），轉而關注個體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張力，並採用現代性、種族、族群和性別等等術語來刻畫這種張力。第三，隨著美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步入了所謂的後現代性，以及隨之而來的“關注內心”的轉向，上述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女性主義興起了、後現代主義者對“男性主流”（malestream）或“基要主義”認識論進行了強烈批判。最終導致的結果是，認同最終在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社會學描述中佔據了核心地位。最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你贊同我對福柯的實在論式的解讀，那麼就會發現，上述強化所借助的主要手段就是誤讀福柯對話語的理論化。我將試圖解釋的不是認同群體為什麼會在二十世紀的北半球變得如此重要，而是認同這個概念為什麼會出現，並廣為人們所接納。



二 從資本主義到現代性

爲了更好地理解特定時期的話語構型的特質所在，我們最好將它與另一時間的話語構型相比較。因此，我將通過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與社會學有關的話語構型的狀況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狀況相比較，來揭示前者的獨特性。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社會學仍然是整個歐洲或歐洲某些具體國家疆域內的一種智力活動，人們很少對社會學各種思潮進行整理，或編寫教材。當時兩個主要的國別傳統是法國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塗爾幹主義）和德國傳統（馬克思主義和韋伯主義）。然後才能提及到英國和美國等傳統，它們理論抱負較小，更多注重經驗研究和政策導向，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複雜多樣。¹¹ 儘管如此，很明顯的一點就是，即便是在英國和美國，社會—結構/制度的情結依然濃厚，並從中產生了社會學這門學科。古典理論家的著作中就常常充斥著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魅影，即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自由民主統治的治理話語，它們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馬克思、韋伯、塗爾幹成爲了該論域的權威作家，結果導致該學科將自己的目標定位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由此在不同程度上也牽涉到了階級張力和階級衝突。相應地，這些古典理論家創造的辭彙大部分成了專家話語，如果某人要談論社會生活，並希望得到別人的認真對待的話，那麼他就必須使用這套話語。同樣，這些理論家也爲社會學這門學科提供了概念框架，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元理論層次上的差異，就激發了不同策略或者說完全不同的理論化的產生。這種話語構型就產生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古典社會學。然而，正如索緒爾所暗示的，或福柯所闡明的那樣，話語構型以及我們看待（這些構型產生的）世界的方式始終是變化的。

當然，第一個重大的後古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流派出現在美國，而非歐洲。其創始人是曾在德國學習過的美國



人，塔爾科特·帕森斯。在他的《社會行動的結構》（*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書中，¹² 帕森斯對古典社會學進行了非常明顯的美國式的解讀，他應該對這種偏離負主要責任。之所以說是非常美國式的，是因為這種解讀不再將古典理論視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描繪，相反，它為富有創造性的個人主義理論，即“唯意志的行動論”（the 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的建構提供了關鍵因素。這種理論，按照塗爾幹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建立”。¹³ 此後，不管是在智識上還是地緣政治上，社會理論都是在大西洋的制度化背境中發展，其中，美國派佔據主導地位。這一點有明顯的例證：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國社會理論，尤其是帕森斯的理論，逐漸轉變為明顯具有歐洲風格的整體性理論。然而，這種理論從表面上看似具有某一社會學家個人的特色。儘管美國已經建立的經驗主義傳統佔據主導地位，但是該理論與其說是從經驗中產生的理論理性，不如說是由帕森斯一手包辦出來的理論。帕森斯，很有可能是受了戰時他對德國和日本社會結構的考察的影響，將其思路從創造性的個人主義理論轉向美國具體的社會環境，並合理地推演出一套抽象的語言來描述這些環境。不久後，其他人就將帕森斯投射到美國的這種抽象表徵命名為“現代性”。

為什麼是“現代性”？在我的其他著述中，¹⁴ 對此問題進行過詳盡的討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不管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很多人都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個術語，這一點非常令人驚訝。他們中很少有人探尋“現代性”這個術語的社會學系譜，而這個詞語不過是作為後現代主義興起的後果而重新出現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沒有人對相關的話語構型的演變進行研究——正是這種話語構型使得現代性成為了當代理論話語的關鍵因素。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學者，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其進行界定，要麼將之等同於笛卡兒認識論的興起、第一次和/或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



生，要麼等同於具有創造性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個人主義的興起。由此，他們就沒有意識到這種要素選擇，或者如福柯所說的要素的“傳播”，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精確地複製了大西洋主義社會理論的未思或者話語構型。接下來，我將對此進行深入闡釋。

一般認為，現代主義的話語首先是在藝術領域內發起的一場廣泛的、因而也是鬆散的運動；而這些藝術領域確實也深受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因素（笛卡兒認識論的興起、第一次和/或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生，或者具有創造性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個人主義的興起——譯者注）的影響。現代主義話語浮現的過程中，“現代的”（modern）一詞最初的消極含義逐漸被顛覆。現代主義在十九世紀被孕育出來，在世紀之交時已經廣泛地顯現出來，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些說英語的國家都認為自己是“現代主義的”。¹⁵ 然而，人們卻很少意識到“現代性”含義的擴展——包括社會環境，而不只是美學環境——主要是一項美國的事業。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盛行於歐洲，不少知識份子逃亡，美國成爲了藝術方面現代主義實驗的中心（隨著抽象表現主義的興起，紐約取代巴黎成爲了世界的藝術之都。在 <http://www.Artcyclopedia> 這一網址中，搜索“Movements”，會發現抽象表現主義是第一個後—超現實主義的繪畫學派）。人們開始反思爲什麼這種美學移植能成功，於是對美學現代主義中隱含的本可能是批判的、進步的社會診斷進行了斯多葛式的、厭世的解讀，並在部分美國文化知識界佔據了主導地位。這種解讀，只有在新政或者“社會現代主義”（social modernist）¹⁶ 等一攬子改革（最小的福利國家、對負責任的工會頒發執照、對機會公平的社會承諾）下才成爲可能。這種解讀認爲自反性（self-reflexiveness）、競爭能力、靈活變通性是現代世界應該具有的品質——貪圖更多有可能招致集中營回歸的危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行將結束時，冷戰開



始了。這種診斷就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辭彙庫，當然也是一個便利的歇腳之地，因為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如丹尼爾·貝爾和大衛·裏斯曼，踏上了新的征程：對於美國現狀，他們從“社會主義式的疏遠”到“妥協”。很明顯，這一征程是必要的，因為美國社會主義不能達到它所勾畫的“現代性”的要求。¹⁷

三 現代性的式微與認同的興起

三十年過去了，飽嘗了後現代主義的後果之後，一些西歐社會科學家熱情洋溢地在他們的話語中引進了現代性這一概念。他們對自身社會（指西歐社會——譯者注）的描述並沒有因為他們要麼接受了美國的經驗主義，要麼接受了帕森斯主義而改變。然而，他們對整個歐洲社會（不僅僅是西歐社會）的描繪卻發生了變化，這要歸功於他們後來採納了帕森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話語（例如“傳統”、“工業化”、“分化”、“現代性”、“行動者”等術語），並在不知不覺中引進了大西洋主義的未思，接受了作為這兩種理論之基石的人文主義本體論。¹⁸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經濟開始衰退，各種衝突凸現，進一步削減了各個公司的利潤。那種美利堅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意象所激發的社會共識被無情撕毀。這時，這種人文主義本體論及其典型特徵的個人主義重新登上了歷史前臺。對於貝爾這類美國社會學家來說，上述現象導致的社會動亂不過是證實了美國先進的現代性，因為這些動亂反映出了一系列與中產階級規模擴大有關的張力：“期望的典型軌跡……告訴我們，沒有任何社會能夠在保證正義，並……逐漸開放的同時，能夠以非常舒坦的方式經受住接下來的社會震盪”。¹⁹ 還一種被隨後的事實²⁰ 所證明的觀點，它認為：這一時段正是美國聲稱自己處於先進現代性的時



候：這種聲稱顯然是經不起審視的，因為這段時間存在大量的階級衝突——在經濟領域裏，表現為高度的產業雇工運動（不管是否是正式的雇工）；在整個社會領域中，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該觀點進一步指出，這些現象成功地（並將繼續）削減中產階級獲得的好處，結果就是，儘管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有所擴張，但是其內部的上層等級已經變得相對貧窮了。²¹ 此外，越戰帶來的陰霾與階級衝突以及相關的代際張力交互作用，產生了一整套的以青年為導向的中產階級社會運動，這些運動追求婦女解放、同性戀合法化以及“參與式民主”等目標。然而，我們下面將會指出，那時候所說的“運動”的產生並不意味著帕森斯理論的影響，以及推動該理論產生的知識界力量和社會勢力的影響全部被瓦解——這還為時過早。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經濟已經好轉，勞工運動也相對平靜下來，戰爭結束了，大街小巷也或多或少地恢復了秩序——但有一點除外：“員警與小偷”之間的鬥爭升級了。總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入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們更加看重未來的職業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已經就業了的大學生們，即未來的“雅皮士”們（yuppies），卻開始在那些不斷擴散和商業化的運動主題中追尋人生的意義：越來越嚴重的吸食毒品現象——為了追求更愉悅的快感，人們更多地使用可卡因，而不是大麻和搖頭丸了；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但這種意識是通過商業化和個體化的活動，而非共同體或者“部落”的儀式得以達成；女性主義——追求的是更實用的平等權利修憲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而不是浪漫主義的“解放”；公民激進主義——但主要用於生態事業而非公民權。總之，人們尋求的是一個“新的時代”，而非一場“革命”。²²

這種向相對平靜的回歸見證了一種內心轉向，許多社會群體和個人儘管對現狀非常失望，但還是妥協了；此外，作為重新確



保公司利益之部分策略，國家開始退出，不再扮演各種價值、政策和專案的終極護衛者了——這些價值、政策和項目曾一度關乎機會平等，正是因為它們，美國才被其國民視為一個現代的社會。這種轉向的結果就是，美國成爲了第一個，有可能是唯一一個所謂的後現代社會——那時候，其他社會在其統治話語中都不曾用“現代”來描述自身，也不曾明晰地將現代性等同於人人機會平等。儘管有些人自詡爲保守派，而且有意識地拒斥後新政時代的社會現代主義，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有的事物確實發生了變化：“有批評者指出，美國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因爲它的現實與理想不符。這些人是錯誤的。美國並非一個謊言；它是一種失望。但是它能成其爲一種失望，唯一的原因就是它本身也是一種希望”。²³

人們應該很容易就意識到，這種論斷的扭曲邏輯可能會被作爲那時即將來臨的意識形態危機的明證。結果，這種危機並沒有發生。相反，人們卻發現資本主義並不能夠給每個人帶來機會，面對著這樣的一種創傷，我所說的“官方美國”（official America）採取的應對策略就是不斷發作越來越長的社會遺忘症。這種病症的發作在今天仍在持續，並無意識地採取這樣一種陳詞濫調的宣稱：美國是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樂園。與之相伴的是，它又同樣不自覺地遺忘了自新政以來所有政府的承諾，即政府將盡最大的努力使所有人都能得到機會。換言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不管是實質上的，還是名義上的“現代”事業，官方美國都已經放棄嘗試了。同樣，它也放棄了去爭取它一直堅稱的一個神聖字眼——機會——該詞語意味著成千上萬的貧窮美國人的生活將有顯著的提高。然而，正是這一詞語的神聖性，使得任何一個身處主流的政客都不敢對美國社會的完美提出質疑，除非他不想當選。就如在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的情形下一樣，在巴羅克式的宏偉氣勢下，敬畏是最恰當的態



度，就如“震懾與敬畏”（shock and awe）是行使權力的最優模式一樣。結果就是，美國（至少就政界而言）進入了讓·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說的“超真實”。²⁴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常常顛倒了事物之間的關係，認為頭腦中的意象產生了物體，而不是物體決定了人們的意象。這種顛倒產生的結果就是，從豐胸到狄斯奈樂園，人們更加看重的是模仿，似乎模仿比真實更安全，更完善。相應地，在當今，“選擇”（choice）代替了“機會”（opportunity），成為官方話語的核心範疇²⁵；“選擇”不過是對“機會”模仿，儘管二者看似說的是同樣的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選擇”比“機會”更安全，因為它並不意味著事物是平等的，因此在權力和資源安排上，並不需要做出什麼改變；“選擇”比“機會”更好，因為它意味著自由是不能被增進的。此外，一旦政治話語成為生產和維持模仿的工具，而不是承諾和證明獲得可控目標的工具時，它就成為美學領域的一部分，再去檢驗其效度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時宜的了。從而與巴羅克風格一樣，政治完全成為個人化的事情了，只能接受美學的和情感的反應，因為對於某一特定的宣稱論斷，或更常見的是對於該宣稱的發言人，公民們就只能發表如此看法——他們是否喜歡它/他，或者對此有任何感受。

個人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退出，以及政府的退出同樣也發生在歐洲。不同之處在於，在歐洲程度稍微輕一些，並且其大眾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支出的底線要高一些。因此，歐洲就避免了美國的那種社會遺忘症。即便是布雷爾/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目前也仍局限於作為一種社會民主的變體，因而仍致力於追求社會正義。相應地，用“選擇”來替換“機會”，在歐洲是行不通的。這是因為選擇仍與支付的能力相關聯——誰會去自由地選擇劣等的住房、學校和醫院呢？最終，在歐洲，自由不可能像在美國那樣是一種倫理上的絕對物，因為基督教和社會—民主的統治



話語都認為爲了共同利益應該對個人自由有所限制。因此，儘管歐洲許多政客都堅決地（並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得成功）對資本主義內在的病理學視而不見，但是其政治話語並沒有逃逸到神聖的和美學的領域，而是仍舊停留在世俗的、有爭議的領域。由此，指控某一政客在治理方面的虛偽和謊言，遠比控訴其在性行爲方面的不當要有力得多。

若不考慮各自面臨的特定處境，大西洋兩岸的社會學家很難理解事情的進展。不管是古典範式，還是帕森斯主義，抑或是現代派，用福柯的話來說，都沒有掌握表述、概念和策略三方面的資源來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學科的實踐者們往往都向鄰近學科尋求靈感，甚至是概念。就此而言，尤其是在美國這個高度個人化的文化中，對那些困惑的社會學家以及失望的個人和團體而言，最大的靈感來源就是心理學，並從中引進了認同這一概念。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佛洛德的理論及其變種就將個體認同這個主題（如果不是一個簡單的單詞的話）變成了一種普遍的關注，這可以從許多電影、小說以及自助的書籍中得到印證。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美國社會學家，尤其是理查·森內特（Richard Sennett）²⁶ 和克里斯多佛·拉什（Christopher Lasch）²⁷ 就對人們關注內心的轉向進行了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解釋，他們借用佛洛德的術語，將這種轉向稱之爲“自戀的”。公司化的美國（corporate America）將人們變成了“孤獨的大眾”²⁸、“白領”²⁹、“組織人”³⁰。爲了盈利，企業吸納了大量的男性勞動力（父親角色），從而家中留下來的是大量的女性（母親角色）³¹，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成長過程中父親似乎是缺失的，他們由此也沒有解決好“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es）。結果，這一代仍需要依賴他者來理解自我。然而，這種思潮的吸引力並不是特別強大，既沒有吸引住那些失望的人們，也沒有吸引住那些試



圖理解這些失望者的人們。顯然，大眾用來思考問題的關於個體的概念在戰後也是不斷變化的。具體而言，這一概念與佛洛德無意識理論中的那種具有反抗力的生物性的東西很少關聯，而更多地指涉的是一系列反應靈敏的認知能力，這些能力能被積極有效地用來形塑一種認同，從而預設著人們能選擇自我。

帕森斯的理論對這種“認知轉向”有著直接的和重大的作用。帕森斯在哈福大學的同事，心理學家愛德華·托爾曼（Edward Tolman）曾受邀參與到《邁向一般行動理論》（Parsons and Shils,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這本日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書籍的醞釀過程中來，他後來成為認知心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托爾曼指出，個體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必須事先有一系列的學習和調整，並且還須對這些過程進行反思；而帕森斯的心理學理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強調了“思考”（thinking）的重要性。托爾曼將這種思考理解為一種反思性：

思考的過程……似乎包含一些內心活動，這些活動能使行動者在沒有實際地執行某些特定的行為的情況下，也能預想到該行為產生的後果。根據這種預想的結果，行動者就能修改、重塑或者擴展他的行為空間及其信念母型……對這一過程的令人滿意的心理學研究……即將書寫嶄新的一頁。³²

這種使托爾曼意識到了思考的重要性的樂觀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認知心理學，較之於早期的行為主義和佛洛伊德心理學而言，對那些失望者及其社會學的同情者，以及其他意欲前行的人們來說，更加具有吸引力。³³ 那些對現實不滿者，以及妥協者，之所以喜歡這種認知心理學，原因在於它能提供智識上的和科學上的支援，使人們的志向抱負更加具有個性化。而對於社會學家



來說，則是因為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們就對這方面的研究感興趣，尤見於當時建立已久、但仍處邊緣地位的一種認知學派，即符號互動主義。該學派不僅關注自我的生產，而且還對子文化的認同做了大量的研究。

這種內在轉向的認知導致了社會學未思的本質的改變，這一點最早表現在如下事實上：在社會理論中，人們重新強調“行動”和“能動性”等概念，而不再是“系統”和“結構”等概念。這種旨趣的轉變最終導致了我在引言中無不遺憾地提到的唯我論。這種轉變最顯見於兩種非常有影響力的理論中，它們將社會結構這個概念進行了改造。在一個查理斯·勒默特（Charles Lemert）所說的“結構消失後的時代”³⁴中，這兩種理論自詡為結構這一概念的最後避難所和最終的希望。其一是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在此中，主客體，或者說能動者與結構的二元論被“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所代替。在《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一書中，吉登斯以一種顯著不同於其之前乃至於之後的著作的方式（這一點他自己也幾乎未做解釋）提出了結構化理論，包羅了勒默特所說的“新社會學”的關鍵命題：

1. 強調“人類行為的積極性和反思性等特徵”；
2. “在解釋社會生活時，賦予語言和認知能力以重要的作用”；
3. “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哲學的重要性下降……〔這意味著〕自然科學哲學必須能對社會理論新學派感興趣的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和說明——尤其表現在語言和對意義的闡釋方面”。³⁵

以此為基礎，他這樣來解釋“結構二重性”：人類的社會活動，就像自然界中其他的自我再生產過程一樣，具有循環往



復的特性。也就是說，它們的存在本身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造成的，但卻持續不斷地被後者再造出來。社會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復創造的社會實踐，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借助這些活動，再生產出了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³⁶ 正是由於吉登斯堅定的人文主義關懷（在此處指一切社會的事物最終被化約為人類個體及其互動），他預先就排除了世界上存在一種不同於人類行動者的社會存在的可能性（因為這種存在是不可見的）。社會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過是“能動者……能夠進行身體的[移動]，其屬性與能力能發生互動……與此同時，能動者相互之間還發生互動”。³⁷ 這成了吉登斯結構這一概念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吉登斯將“規則與資源”作為了能動者的“物理環境”，這在某種程度上，就讓人想起了帕森斯將“手段與條件”放在了“單位行動”中的作法。正是這樣一種方式，使得社會結構從吉登斯的理論中消失了，而唯我論佔據了上風——也就是說，社會結構被化約成了他人所制定和收集的規則和資源，這種規則和資源在時空方面都是先於行動者的行動的。因而，社會結構成了“抽離了時空，作為一種記憶印痕（memory traces）而存在於各個實例之中”³⁸。如果個體大腦中的“記憶印痕”就是社會結構的全部的話，那麼除了人類個體以外，還有什麼東西能為“結構二重性”的觀念進行辯護呢？既然所有的社會生活都印刻在個體的頭腦中，並且吉登斯似乎實際上也是這樣認為的（儘管他並沒有公開承認這一點），那麼就無須到個體大腦以外的領域來探究社會生活了。

第二個關乎“社會結構”之命運的理論就是“新制度主義”。這一理論一直是美國社會學家中流行的最有影響力的“形式理論”（formal theories）。新制度主義的追隨者們認為該理論是理性選擇理論的“行動者中心主義”的對立面，儘管後者俘獲了不少經濟學和政治學理論家。³⁹ 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社會學家



不應該將社會理解為由行動者構成，而應理解為由“組織”或者制度化的“知識和文化”構成。新制度主義的因果觀關注的是“集體層次，並且本質上是文化的——一切過程是發生在制度之內和之間的……與之相關的人們扮演著被制度高度建構的社會角色，根據他們的文化的和職業的傾向性而行事——也就是說，人們是特定文化系統中的能動者，而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個體‘行動者’”⁴⁰。很明顯，新制度主義紮根於現象學，隨後，其“組織”這一概念越來越被化約為“知識和文化”，而能動者（agents）則逐漸簡化成了行動者（actors）。這不足為奇，因為新制度主義就如帕森斯主義一樣，其大量研究的重心和理解都是美國中心主義的。具體而言，新制度主義以如下幾條論斷為基礎：首先，美國是最典型的現代社會；其次，由於美式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形式的擴散，西方的歷史不過是一種現代化的過程或者說向美國這一典型趨同的過程——也就是說，“西方歷史的主調就是世俗化和個人主義的呈現”⁴¹。因此，當今傑出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家們似乎都遺忘了他們的定位——反對“行動者中心主義”，也對制度失去了興趣，轉而去關注“當代的認同爆炸”⁴²。

儘管認同理論的心理學資源滋養著“新社會學”，並且他們所強調的反思性也迫在眉睫，但是它們對社會學界的佔領並不能用寬泛的社會結構和純粹的智識發展來解釋，更不要說大西洋兩岸的很多學者仍是古典理論的追隨者，並強烈反對認同理論獨霸天下。要想克服這種抵制，就需要質疑現有的概念和策略，還需要敢於擔綱此任的專家顯身，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和議程。這種情況的發生常常是新的智識空間的建立相對地不受限於既有的話語構型。這方面的主要領域就是女權主義，以及部分有交叉的類似社會運動的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這些新領域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和廣泛關注，尤其是急需新產品的出版業的青睞。正如吉



登斯和新制度主義學者所關注到的非預料後果一樣，這些新領域的出現也產生了非預料的後果：許多曾有一定理論立場的社會理論家突然之間轉向了這些領域所關注的問題，並採用其概念框架（他們很少解釋這種轉變的理由），從而將以前的問題和概念拋諸腦後，像政客們一樣，進入了遺忘的狀態。這樣，被遺忘的不僅僅是政客們曾經許諾的希望，還有他們許諾要解決的問題。

或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女權運動最有效的和最難以忘記的口號就是“個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儘管女權運動的方案並不完善，但其取得的成就卻是不容小覷：在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中，女權運動都是重中之重，並且在社會中，婦女及其所關注的事宜都不再是邊緣的了。也就是說，在社會學的研究旨趣中，所謂的“家庭”這一“私人領域”和親密關係，就與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這些“公共領域”取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樣，社會學也大力關注公共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的原因以及維持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力量。很明顯，在一段時間內，社會上以及社會學中“女性問題”的興起，極大地顛覆了社會學曾經的規劃藍圖。這是因為，與種族和族群認同研究不同（以及還有一些我不曾瞭解的原因），對婦女集體認同的關注挑戰了既有的元理論立場，產生出了女性立場認識論（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即FSE）。出乎意料的是，女性立場認識論提供的仲介到頭來並沒有使個人的變成政治的，反而更多地使政治的變成了個人的。此外，由於人們常常認為女性立場認識論是與一場非常成功的社會運動相聯的，因此，這種反思轉向的唯我論變體在智識合理性與潛在的政治意義方面就被誇大了。

與女權主義類似，後現代主義通過其理論和方法論關注，也使得認同代替了社會結構。我將再次對方法論方面簡而言之。非常有趣的是，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教材中，話語這一概念成爲了反實在論的一部分。阿蘭·布里曼（Alan Bryman）在其非常有影



響力的教材的最新版中，對他人的思想進行了總結，這樣來界定話語分析的：

它是反實在論的：也就是說，它否認存在一個有待於研究者進行描述的外在的實體，從而它也否認任何研究者能對其研究的社會世界做出最權威的解讀。有一些話語分析其立場與實在論相近，但大部分卻是反實在論的。

它是建構主義的：換言之，它強調特定社會情景中的成員各自建構自己的社會現實觀，並強調這種建構是如何發生的。具體而言，建構主義認為話語不過是從許多備選的表述中選擇的一種而已，在這個過程中，生成了一種特定的對現實的描繪。⁴³

這就表明，在後現代主義者那裏，話語已經和它的話語構型的社會基礎脫離開了，也就失去了在福柯那裏獨特的物性（thingness），成為了社會行動者向他們自認為創造的社會生活上投射自己欲望的手段。

這樣，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裏，社會結構逐漸被認同吞噬。這是我所說的社會學的未思或者話語構型的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首先，社會學本身就是一個客體，是大西洋制度場景的產物。隨著美國由兩大超級大國之一變為唯一的霸權國家，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由現代社會轉向了後現代社會，大西洋這一制度場景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其次，作為一種談論和書寫的形式，社會學越來越文化主義、心理學趨向了，也越來越反思自己了。第三，那些曾一度依賴社會結構並賦予其意義的特定概念也逐漸被文化和話語等代替，後兩者為認同這一問題領域創造了可能性，並賦予其內容。第四，從策略上來看，這些發展都被囊括進了激進的女權主義運動以及學術上的激進後現代主義，這兩



者都致力於對社會生活進行全方位的重新理論化，並把對資本主義及其病理學的研究全然邊緣化。

那麼對這些活動進行實在論的反思又有何意義呢？意義之一，就是可以表明唯我論的反思的興起可以從社會方面而非精神方面得到解釋，從而提供一個例證，以表明我們如何能避免唯我論，如何將經驗研究與理論重新聯繫起來，如何能避免這二十幾年來理論判斷的災難性失誤。這樣做的另一個意義是，能使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從而進一步參悟我們的角色和義務對我們的要求。作為社會學家，除非我們能成為福柯所說的界定權威（authorities of delimitation），能夠影響那些界定我們所研究的客體的說明規範，並能界定對象的內容，否則我們不能影響我們所研究的客體的本性。即便我們能做到界定權威，該對象領域是否構成一個問題域也更多地是被社會發展所決定的，而這些社會發展正是社會學所要致力於理解的現象。當然，在某些方面，我們能夠對社會如何被理解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力，這就在於我們採用了不同的論述方式、概念和策略。這不僅界定了我們的自由的範圍，也界定了我們的義務所在，以及追求善的機會空間。因此，我們必須在這些方面做出判斷，而不是讓它們來為我們作決策。

這就是說，對任何社會學優點的實踐的有效性都可能是有限的，因為正如福柯所說，在非話語實踐和欲望中，特定話語的功效是變化的——非常不幸，對資本主義病理學復燃的興趣在政治上不會受到歡迎，並且如我們都知道的，欲望追隨的總是新奇。結果就是，人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與其他任何良善的實踐一樣，社會學的美德並不能確保每個人都會留意到它。儘管如此，希望總是存在和閃耀的，因為話語構型的構成規則總是不斷變化的。在我看來，就像已經消逝的話語構型一樣，我這裏所描述的話語構型也將成為過眼雲煙。原因很明顯：要勉力對付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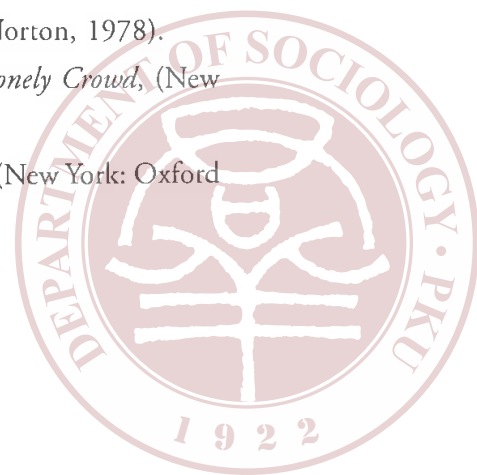
就要求承認世界一直存在社會一結構（或其變體），尤其要認識到亞洲的社會一結構之不同之處。不過，要揭示我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將會構成另外一篇文章了。

注釋

- 1 本文原題為“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eor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is Found There”，是作者 Anthony Woodiwiss 參加2009年11月28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北京大學—首爾大學社會學系雙邊學術研討會：中國和韓國的社會轉型”會議提交的論文。現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07級博士生白小瑜譯成中文。——譯者注
- 2 Lewis Carroll,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she found there*, (1871), 1.
- 3 在這段引文中，有兩個術語值得區分：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和個體化（individuation），這也是 Lash 對簡單現代化和反思性現代化的區分點之一。——譯者注
- 4 Lash, Scott,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s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112–113.
- 5 Pierre Bourdieu,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Ch. 3.
- 6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7 Pierre Bourdieu,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35.
- 8 Ibid, 238.
- 9 A. Woodiwiss, *The Visual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Athlone, 2001), Ch. 4.
- 10 關於大西洋中心主義的發展，參見 Van der Pijl,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1997).
- 11 P. Abrams,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12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7).
- 13 M. Traugott, *Emile Durkheim o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14 Anthony Woodiwiss, *Social Theory After Postmodernism: Rethinking Production, Law and Class*, (London: Pluto, 1990, ch. 7); *The Visual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Athlone, 2001), Ch. 3.



- 15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Modern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 16 Anthony Woodiwiss, *Postmodernity USA: On the Crisis of Social Modernism in Postwar America*, (London: Sage, 1993), Ch. 1.
- 17 D.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D.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D.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H. Brick, *Daniel Bell and the Decline of Intellectual Radicalism: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1940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N.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thony Woodiwiss, *Postmodernity USA: On the Crisis of Social Modernism in Postwar America*, (London: Sage, 1993). Anthony Woodiwiss, *Social Theory After Postmodernism: Rethinking Production, Law and Class*, (London: Pluto, 1990), Ch. 7.
- 18 Anthony Woodiwiss, *The Visual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Athlone, 2001), Ch. 2.
- 19 D.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179.
- 20 Scott A. Sandage, *Born losers: a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1 Anthony Woodiwiss, *Postmodernity USA: On the Crisis of Social Modernism in Postwar America*, (London: Sage, 1993), pt. 2.
- 22 Ibid, 97.
- 2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policies for American security*, (Ballinger Pub. Co., 1982), 262.
- 24 Jean Baudrillard,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5 D. Frank, J. W. Meyer, *The Contemporary Identity Explosion*, mime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 26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Norton, 1977).
- 27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Norton, 1978).
- 28 David Riesman,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29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30 William H.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Penguin Books, 1963).
- 31 B.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1963).
- 32 E. Tolman, 'A Psychological Model,' in Parsons an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57.
- 33 關於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對美國的精神分析傳統產生的影響，可參見 M. Rustin, 'Private Solutions to Public Problems,' mimeo,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2004).
- 34 Charles Lemert, *Sociology: after the crisis*, 2nd e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 35 所有段落摘自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xvi.
- 36 Ibid, 2.
- 37 Ibid, 112.
- 38 Ibid, 25.
- 39 關於“理性選擇”這一概念的興起的研究可參見 S.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40 R. Jeppers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o-Institutionalism' in Berger and Zelditch, *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233.
- 41 J. Meyer, 'Myths of Socialization and Personality,' in Heller et al.,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0.
- 42 Frank, David and John W. Meyer. "The Contemporary Identity Explosion: Individualizing Socie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Sociological Theory* 20(1), March 2002: 86–105.
- 43 A. Bryman,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60.

